

科學不能與生活分離——訪 Vinod Raina 談印度民眾科學運動

轉載自《新國際》（2007-07-06）

《新國際》編輯部

文諾（Vinod Raina），物理科學家，參與「印度民眾科學運動聯網」（AIPSN-All India People's Science Network）近 30 年，是民眾科學運動的核心成員。2007 年 8 月，文諾即將抵達台灣，全程參與浩然基金會所主辦的「另立全球化工作坊」（Workshop for Alter-globalization）。

90 年代初，民眾科學運動協助印度政府推廣掃盲運動，設立專注教育的組織「印度促進科技知識與智慧協會」（BGVS）。掃盲運動用了微薄的經費、卻動員了大量義務人力資源，短短 5 年間，幾百萬義務工作者為幾千萬人掃盲，成就驕人，KSSP 在 1996 年獲頒發號稱另類諾貝爾民生獎的「優質民生獎」（Right Livelihood Award）。文諾曾任多屆印度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，也是著名的尼赫魯學院院士。他的組織「艾嘉娃」（Eklavya）編輯兒童雜誌，推廣少年科學運動。

以下訪問在印度喀拉拉邦進行。出席者有來自北京、香港、加爾各答的多名學者研究者，由香港嶺南大學的劉健芝博士作主要提問。劉健芝博士同時也是「另立全球化工作坊」的主持人之一。

在矛盾中尋找有創意的元素

文諾：你們來喀拉拉邦作文化交流，我會問，這些聽聞對你們來說有什麼意義？構成怎樣的新經驗？怎樣引發深層思考和感受？我希望我們談談，在更理論的、深層的、人的層面，是否有共同的線把我們牽引在一起？如果有，是什麼線？我相信，你們有興趣的，不僅是表面的印度的社會狀況，或民眾計劃，或民眾科學運動。

的確，我會問，你們干嘛對科學運動有興趣？在現代世界，主要的壓迫者似乎是科學，是太多的科技。我們無可避免地要審視我們每日周旋其中的矛盾，在矛盾中尋找 有創意的、有生命力的元素。我假設大家會認為自己不是機械的馬克思主義者，不會主張階級鬥爭是唯一的革命工作方式。階級既不是唯一的參照點，我們會接受環 保主義、女性主義，而這些並不能裝進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框架之內。然而，「科學運動」卻很容易讓人想到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思路——要使用科技、要多生產、然後 把生產社會化、平均化。然而，一個人能否同時堅信環保主義、女性主義和科學運動？科學運動能否兼收這些相互矛盾的概念？我提出這些問題，因為我沒有答案。 只有矛盾。我希望其他人也來面對這些矛盾，在想這些問題，我們之間便有共通的聯繫。

問：我們有興趣的，正是你怎樣處理纏繞你的這些問題。我們不是要找一個印度模式來照搬。作為知識分子，作為尋求社會變革的實踐者，我們也在不斷反思，希望你可以分享一下。

文諾：我們不僅僅是說自己的故事，而是要分享我們一直不得不面對的這些問題。所以我打算從這點開始，而不是談我以前做了什麼、怎樣去做。

首先，我們許多人面對的問題，是我們想不斷放大我們所思考的問題，但在正規機構裡工作，卻無法尋得這種思想的空間。舉例來說，大學學者被大學機構的要求所束 縛，大學要求你把研究做得越來越精細，越來越窄；你可以更深入，但卻更狹窄了。你要自我界定為社會學家、物理學家、文化研究家，屬於什麼什麼學系，什麼什 麼專科，無法以我現在提問的方法去探討問題。當時，我們民眾科學運動的人，相互不認識，卻各自得出一個答案：我們有興趣的不是這種學術工作。你不可能坐在 物理系裡大談物理與女性主義有什麼關聯。如果要探討這

些矛盾的問題，正規學術機構的限制太大了。

第二，我們發現，以大學為知識有系統地生產的基地這種觀念，在某種意義上否定了民眾的知識。社會文化的發展，把知識層級化，把大學所生產的知識說成是好的、有文化的、值得審視的，普通人的知識則是差劣的，教育這些人意味著讓他們丟掉後者，獲取前者。我們當時對此存疑，今天我當然可以說我對此否定。

帶著這類令人不安的問題，我們如何在社會上發生作用？你不可能再呆在大學裡，那裡有太多的規條、約束。我們許多人不約而同做過多種嘗試。舉例來說，我在 1972 年與許多鄉村教師一起工作，很窮的教師。我們在印度常會說，這些鄉村教師太差了，所以我們的教育制度這麼差。當時，我在寫博士論文。與鄉村教師一起工作了 3 個多月，我發現我在他們那裡學的，比我做博士論文鑽牛角尖的研究學的更多。我從他們那裡學到的也是科學。麻煩的是，兩者對我都重要，我今天還是有這個矛盾，我不能在兩者中間作取捨。我不清楚可以怎辦。我以前做電腦軟件，很愛做。可是，對於鄉村教師來說，科學不能與生活分離，不能與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分離。我在大學的工作，卻是科學、生活、社會、文化、經濟各自分離的。

在與鄉村教師的工作中，我取得了深刻的體會。我嚮往社會主義，嚮往平等，但怎樣走向這個目標呢？印度有許多人，醫生、工程師、科技人員——與我這種想法接近，想把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才能與民眾的知識一起運用，走出不同的路。這就是民眾科學運動的基礎。

那麼，這些最後是怎樣會聚在一起呢？之所以出現，是因為我們對發展有不同的看法。我們做的，不是教授不同的科學，而是發展出關於發展問題的全新看法。

而且，我並不是知識的泉源，由我去告訴人民對他們來說什麼是壞的。我們是「夥伴」，合夥的基礎是我的知識加上他／她的知識都是新的變革所必需的。這個知識可能是 農民的、醫學的、女性主義的、水源的、森林的，任何一個範疇。它讓我們變得非常謙虛。如果你問我最重要的感覺是什麼，那我會說，是一種謙虛的感覺。你不可 能再以專家、專業人士、學術界人士自居（我把學術界人士和學者區別開來，我認為任何人都可以是學者，我們週圍有很多學者，不過他們不寫滿是腳註的論文罷了）。這種思想過程是把知識融合的過程，而大學則是把知識割裂的過程。

我年青時喜愛音樂、電影、爬山、拍照，入了大學，這些嗜好 都變成「浪費時間」的東西，大家會說，幹嘛不用功寫物理學論文？但當我們走出校園，與人們一起探討不同的發展觀念時，我們不是通過講座來談醫療衛生、食水 資源，而是通過音樂話劇；不是用大眾傳媒的手法，而是用民間媒介來溝通。

在印度，沒有人對音樂不感興趣，只有程度的不同。生產、收割、婚嫁、喪葬，全都有音樂。音樂不在音樂廳中，而是在生活中。

如何「向人民學習」？

問：你說與人民的夥伴關係是知識分子不霸道，反而學懂謙虛。如果這個不是政治環境強制出來的的卑屈羞辱，那麼是什麼令你覺得謙虛？

文諾：我要解釋一下這個「向人民學習」是什麼意思，不然我聽起來像是一個浪漫派。向人民學習並不意味著你放棄所學的，又或拋開你的社會學、物理、文化研究等 專才。不是這樣。在人民的知識裡，有很多不好的東西。在我們的知識裡，也有很多不好的東西，例如物理學的知識會用來製造原子彈。在印度，人民知識裡最大的 問題是對待女性方面，尤其是農村，是非常父權的傳統社會。

1967 年，年輕的學生像被磁石吸引一樣走向毛派運動，以 10 萬計的農民也拿起鐮刀、木棍大規模的動員起來。這個一年之內多起的農民運動，有 150 年的反英反地主的歷史。

問：是否在印度進行土地改革之後發生的？

文諾：印度從來沒有進行土改，只有 3 個邦有——西孟加拉、喀拉拉、喀什米爾。在土地分配問題仍然嚴峻的地方，例如比喀爾，仍有勢力龐大的毛派地下黨，進行武裝鬥爭，而地主進行報復時，殺不了毛派，便把整個村莊夷平。

但這些毛派黨派在今日印度只在少數地區孤立存在，因為印度的代議制民主容許各個黨派參與，比較有份量的共產黨派都參與代議制選舉，可以說，民主進程蓋過革命進程。

問：民眾科學運動並不參與議會進程？

文諾：民眾科學運動並不僅是一批科學家的運動，而是一個尋求社會發展的民眾的文化運動，參與者有電影導演、新聞工作者、社會科學家、醫生、工程師，但更多的是農民、年輕人。你不必是科學家也可參與。

這個運動對兩類知識都抱持批判態度：既批判學術知識，分辨出好的和壞的，也批判民眾的知識，推廣其中有用的。

在 日常生活中，這個運動非常批判自由化和全球資本的流動。在印度這樣的國

家，如果政府不保護它的人民，容許市場手段支配人民，那麼，一大批人會消失，因為市場不會支援以百萬計的小農、原住民、無地傭工。我們不接受後現代的想法：主張國家消亡，由民間社會取代。我們認為我們需要國家，但不是今天這樣的國家。今天的國家是腐敗的，保護的是富人的利益。我們的管治觀念是國家應照顧需要溫飽的人民。怎樣做呢？我們不相信有好的國會議員或好的政治家情況就會好些。我們認為，只有改變國家的結構，才会有改變。國家不必中央集權。我們的信念是，關乎人民直接生活的事情，應該由一千人以下的集體來決定——醫療健康、教育、食水、能源、食物、生計、對當地自然環境資源的控制、等等。為什麼是一千人，因為這就不是代議式民主，而是參與式民主。所有人都應該參與這種國家管治功能，而不是讓一些代表代行這些功能。

今日的印度國家，是以邦民選代表和全國民選代表組成的。印度國會有 525 人，即使全都是好人也無法解決問題，因為一個國會議員代表一百萬人。我們主張由一千人以下的群體在最基層開始作出決策，參與式民主與代議式民主相輔相成。

「參與式民主」的功能

問：有參與式民主就能解決問題嗎？

文諾：可能一時解決不了問題，但會走上解決問題之路。未必解決所有問題，但肯定比只有代議式民主為好。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感受到，喀拉拉邦現在的變化，是每年有 2 億美元由村民直接決定如何使用，不經過任何政府部門干預。喀拉拉邦總人口是 3 千萬。

這筆錢不用還給政府，但必須全部用來做生產性事業。這些事業是通過村民抉擇而不是自由市場來決定的，它們不僅滿足基層需要，也製造就業機會，因而農村基層的經濟生活便活躍起來了。

全印度都有鄉自治組織，都應該搞發展工作，但只有在喀拉拉邦，政府把大量的錢直接交給鄉自治組織，由民眾自行作出決定。

問：所以這兒的鄉自治組織得到的錢比其他邦為多？

文諾：有些完全不把錢下放給鄉自治組織。但更主要的問題是，民眾有錢要花，但會怎樣花？有沒有花錢的能力？這是最大的挑戰。民眾科學運動主要的工作，就是讓 民眾培養出這種能力。運動培訓普通人怎樣搞醫療健康，怎樣搞水利系統。如果沒有這些培訓，錢用不得其所，那麼，傳媒、政客就會指責說民眾不懂用錢，亂用 錢，還是把錢拿回來吧。所以，面對這種張力，民眾科學運動要致力於讓鄉自治組織有更好的能力，同時讓群眾更好地進行監管，令貪污舞弊現形和減少。

問：如果村民要修一條路，就可以修，萬一以後發現這並不是最必需的，是破壞環境的，那怎麼辦？

文諾：鄉自治組織沒有權力決定興建高速公路，只有權在鄉村範圍內修小路。

問：人們一般急功近利，想看到成就，所以寧可修路，不搞教育建設。如果多數人要修路……

文諾：那就只能修路。但鄉自治組織蒐集了各種方案後，會排列優先次序，例如會從 50 個方案中挑選 10 個。這是鄉民代表做的決定，但在這個過程裡，有一些人會 作參謀，建議怎樣管理、怎樣興建、怎樣不破壞環境。但這些人並非來自

「外面」。民眾科學運動多年來在鄉村內部培訓了許多專才，在修路、建築、搞水利等等方面提供技術支援。這些專才大都義務工作，許多是退休的政府官員和專業人士，受過良好訓練。這是民眾科學運動發展出來的模式。

我們可以看到，現在的問題仍然很多。有人會問，民眾做的是否符合環保原則。答案可能是否定的。但是現在正發生的是權力在轉移，人們不會因此變成女性主義者或環保人士。這是以後仍要面對的挑戰。兩性關係現在是否在改變呢？我的回答是，婦女自助小組正努力在做，卻還不能說她們已成功改變兩性關係。農藥殺虫劑是否少用了？還不是，但希望可以逐步向這方向走。然而，你不能就說，因為兩性關係仍不妥，環境仍不妥，所以一概不對勁。事實是，很多人正在嘗試推動變革。

甘地主義「有問題」

問：我們看到到處都有義務工作者——知識分子、退休人士、年青人。是怎麼回事？是印度的傳統、文化？還是因為失業率太高，人們反正有閒暇？整個民眾科學運動的動力來看那裡？你們開始時不過十來人。

文諾：這個問題不易回答。印度的反英民族獨立運動主要是中產階級運動。運動的結果是建立代議民主制度，而不是像中國一樣建立共產主義政權，很多人認為是與民族運動的階級性質有關。甘地、尼赫魯等人，全來自中產階級或中上階層，兩人都是律師，是專業人士，家境富有，但兩人都放棄一切。不僅他們兩人，運動的所有領袖背景也差不多，都是貴族種姓和階級出身，但介入了民眾的動員。我想，當時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也是這類背景。無論是共產主義運動還是國大黨甘地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，你都可以看到許多人甘願放棄家庭、羅網、舒適生活，而擠睡在同一辦公室內，把一生貢獻出來。是有這個傳統，而且很大程度受甘地影響。甘地主義生發了某種義務獻身精神，一直流傳下來。

我覺得這種為理想獻身的精神也有某種宗教情懷。印度教的教義，是把人的一生分為四個階段，頭 25 年是年輕學習階段，接著 25 年是家庭階段，再接著 25 年是放棄物欲，反饋社會；最後的階段則與世人世事無爭，隻身在山中修行。

問：泰戈爾有一本小說名《奉獻》，說的就是通過奉獻達到涅槃。

文諾：奉獻的精神有它的傳統。例如共產黨人，他們的所有物就是一塊腰布，洗淨再用。如果有人有兩、三塊腰布，其他人會用不屑的眼光看他，覺得他太追求物質了。甚至今天也有人是這種看法的。70 年代之前就是普遍這種義務獻身精神。1972 年毛派運動被壓下來之後，一種新的義務獻身精神冒出來，你可以說是 KSSP 類的獻身。不僅是甘地信徒，也有專業人士如醫生、工程師，走到農村與民眾共同生活工作。這種情況只有 30 年歷史。有一個醫生 Dr. Koutnis，28 歲時去了中國，與麻瘋病人一起。

問：可否簡要說你對甘地主義的看法。三個字。

文諾：「有問題。」重新建構、轉化國家管治系統，是甘地主義的，即從參與式民主進而發展為代議式民主。就是你們在喀拉拉邦現在看到的，一千人的鄉民自治小組的自管。有意思的是，這種甘地主義理念卻由共產黨執政的政府來發動推行，但共產黨人一般是反對甘地的。這種權力下放的模式是很可取的。另外，甘地主張分散生產，即農村自足生產，我們在民眾科學運動就是這樣做，因為我們這樣才可以對付全球化和權力資本集中的負面影響。

我們很多人認為甘地有問題的地方，是他的階級觀念。他沒有階級觀念，有的

是一種奇怪的理論，叫做「信託理論」。他覺得，有財富完全沒有問題。如果說有富人窮人，那麼富人是代窮人掌管財富，作為一種信託，而富人會照顧窮人，但不是分配財富。這種信託理念拒絕階級觀念。我覺得這是因為甘地很天真，覺得人性本善，如能造就讓善性發揮的環境，善性便會滲透一個人，他就會照顧他人。這種理論帶宗教色彩，但我覺得信託理論是無稽之談。共產黨人完全否定的是他這種理論。

我只能扼要談甘地主義。對於他的為人，他的政治家謀略，我是很尊重的。他很懂得動員群眾。